



DENG XIAO PING

中央文献出版社

DENGXIAOPINGSHENGPINGQUANJILU

主编 © 苏台仁

邓小平 生平全纪录

邓小平

生平全纪录

主编◎苏台仁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下







邓小平 自述

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二〇〇〇年起我就当总书记。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

第六卷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多次赴苏联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1962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重要讲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了一切领导职务。

赴京担重任

财政部的好当家人

小平同志是1953年9月18日担任财政部长的，那时他是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二办副主任兼财政部长，1954年9月离任。小平同志在财政部的时间虽不长，但很使我们留恋，有几件事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按毛泽东思想编制国家预算

戎子和在《邓小平同志在财政部》一文中谈到：

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我记得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1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1954年6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



· 初任政务院副总理时的邓小平。

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总收入为262.37亿元，超过预算的13.15%，总支出为246.32亿元，完成预算的98.74%，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1953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明确责任的几句话

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话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1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敢随随便便，但心情却是舒畅的。此外，小平同志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情况真实，确切，数字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

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态度

小平同志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曾多次跟我们说：人家批评我们财政部，如果批评对了，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批评的不对，我们就要及时作解释，弄个水落石出；不要因为人家批评得不对，你不作解释，等到问题成堆，有朝一日和你算总帐的时候，你就无法搞清。那时候，因为业务关系，有些和我们很熟的同志，在往来交涉事务中，有时不免相互开些玩笑，有时说些相互批评甚至挖苦的话。但如被小平同志知道，他就追问。我记得有两件事，他知道后，追问得很认真。他问我，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批评，批评得对不对？叫我们查明真象，弄清事实，再报告他。后来，当我们跟他说，我们平时关系是很正常的，这些话只是随便讲讲，并没有其他意思，他就不再提了。

1953年小平同志担任财政部长后，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但那时我对第三条后半句，即结余不上缴，有些不放心，怕地方各单位留多了影响中央预算。小平同志看出来了，一次，党组讨论和征求对六条方针的意见时，在座的六位副部长有五位都说赞成。小平同志

问到我的时候，我就如实地把我的意见讲了，说有半条不通。小平同志立即说，我就知道你有些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约八年，他知道我的脾气，凡我想不通的问题，从来是向领导说心里话，不说假话，而且是不会马上改口的。不过一经会议或领导决定，我就坚决执行，不讲二话。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有些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做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

高、饶事件是我们党七大到八大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也是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邓小平1952年到中央工作不久，便经受了这次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考验。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饶野心开始膨胀

50年代初，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中央工作，并调整、增设中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7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入中央，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兼任财政部长一职。随后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离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1952年8月，邓小平与朱德、贺龙在全军体育运动大会主席台上。



1952年10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前排右二）与毛泽东等合影。

高岗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11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赴京后，他除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外，还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2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进京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应该说，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服和不满。

1953年初，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重新进行了分工：其中外交部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



· 1945年10月，新四军部分领导在山东临沂合影。左起：粟裕、刘瑞龙、谭震林、陈毅、饶漱石。

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的变动。高岗、饶漱石闻讯后更加紧了其阴谋分裂党的活动。这时，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八个工业部，权势显赫；饶漱石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也处在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部长被毛泽东戏称为“吏部尚书”。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跃升，个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泽东这些人事调整是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信任，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1953年夏秋之际，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这边一炮，那边一斗”，演出了一场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

拉山头、搞宗派，高、饶向党发难

高、饶是从大肆攻击和诽谤刘少奇开始其分裂党的活动的。

高岗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来已久。还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高岗所在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由此，高岗对刘少奇怀恨在心，进而不择手段地对刘少奇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和诬陷。他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刘少奇。他说，中国党内有1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的事。交谈中，高岗问这位副主席：“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对方回答说：“当然要消灭！”高岗说：“我就是这个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这位副主席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进京不久，他开始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且是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积累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路线错误，并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尤其是当高岗发觉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工作、工会工作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并对刘少奇有所批评时，便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

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他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于是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1个场所。他们和极少数追随者利用这次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在会上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一直拖到了8月初。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始至终出席会议并做详细记录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详细汇报头一天会议的情况。当他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马上交待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和邓小平都在会上发言，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在周恩来作了总结之后，宣布会议结束。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伙同饶漱石，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他们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当时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应当彻底“改组”中央。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们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高岗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他未向党中央汇报便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欲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中央觉察到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仍执迷不悟，继续对安子文和刘少奇进行攻击。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这个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本着对待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都给了饶漱石1个“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最后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老实认错。这以后，他还继续在毛泽东主席面前说刘少奇、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一些同志的所谓“错误”，并依旧同高岗沆瀣一气，阴谋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

义正词严，邓小平对高、饶说“不”

高、饶看到来明的不行，就转入了暗中。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诱，以求取得邓小平的支持。

对于高、饶这种“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邓小平始终坚持原则，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到中央工作之前，邓小平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到中央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国家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岗、饶漱石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当高岗感到时机成熟时，就迫不及待地找邓小平摊牌，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明确向高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但是，高岗并没有听从邓小平的直言劝告，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组织”活动。他经常在自己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1953年下半年，高岗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同志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当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时，惟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拉拢陈云。他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1个，我1个。同样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觉得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态发展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于是，他们及时把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事隔20多年后，1980年3月，邓小平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的谈话中，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这场党内斗争的情景，他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话，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1个，我1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这一行动，可以说是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发现了高岗、饶漱石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在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他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

粉碎“高饶联盟” 全党敲响警钟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求调换一些政务院副总理。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1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1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厉警告。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会议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是，高岗、饶漱石仍然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对高岗、饶漱石做组织结论。在此之后，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对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开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和人民，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再一次向全党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邓小平在1980年



· 1955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3月的一次谈话中，再一次充分肯定了这次党内斗争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他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对于刚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表现出了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1954年，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视察快艇部队

陈右铭在《难忘少奇、小平同志的关怀》一文中回忆到：

1955年11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来到海军快艇16支队视察。

上午10点刚过，几辆小车驶进快艇支队大院，我看到中央首长下车后便跑步前去向

· 邓小平与刘少奇等人视察海军快艇部队。

